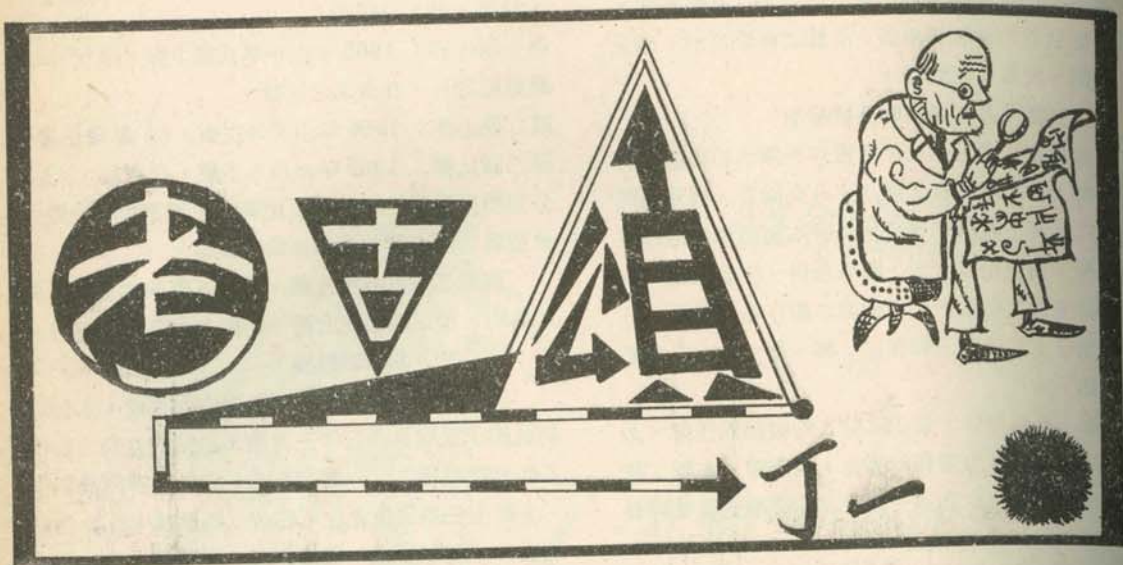




英文“archaeology”一字，在字源學上分析，是由希臘文“archaikos”加上“logos”演變而來的，前者的意義是古代，而後者是一種學問，合起來叫做考古學，是對古代的文字或器物，加以考查研究的一門科學。台大很早就已經設立科系及研究所，附屬於文學院，而對人類考古學（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），對外招生加以專門研究，不過人數不多，每年不超過三十名，在目前中華民國的醫學院中，也有一門所謂醫學考古學（medical archaeology）的發展，由於本科讀起來很有興趣，而且非常實用，所以很受醫學院各科系學生的普遍歡迎，平均每年有六百以上的軍民雙方公立醫學院的學生，加選這課程，因此在這方面，歷年來已經有了驚人的成就。這是在台灣醫學界進入器官移植的新紀元時，一項值得醫學院在校生對外覺得驕傲的地方。

這門課程通常是不計學分的，而由學生本身視自己的需要而自動決定選修。這門課程儘管沒有專人指導，不必上課也不要實驗，平常是很輕鬆的，但是有時却很緊而且非常費勁。本科的主要課程，是學生在考試之前，不管是期中考或是期末考，把授課教授歷年來的考題，有時帶有解題，加以收齊抄下，並熟讀之。

筆者大三時才開始修學此科，起初，由於功課繁忙，加上對考古學存有懷疑之心，正在躊躇不想修學時，有一位以「過來者」自居的四年級老大，臉色嚴肅地向我勸戒說：「解剖學、生理學、生化和組織等是基礎醫學，是臨床醫學的基礎；而考古學更是派司這些學科的基礎，基礎的基礎，是不容忽視的。」並接着警告說：「不聽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。」於是，筆者沒有辦法，只好聽從，迄今有三年了，因此對考古才有正確的認識。

考古學的濫觴，說來也是話長，古今中外的名人，大都可以扯上考古的關係。孔子說他自己是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。」聖人的話自有道理，不必多說。甫剛逝世當代最偉大的史懷特醫生（Dr. Albert Schweitzer），在他的傳記中，提及他在三十歲的時候才入醫學院，由於他兼同校文學院的教授，沒有時間可以好好讀書，他又懼怕考試不及格，不能及時畢業施展他個人的抱負，因此在每逢考試的前幾天，他都有「參考」屆年考題的習慣。英國前首相邱吉爾（Sir Winston Churchill）曾經說過：「有聰明才智的同學，都去學希臘文或拉丁文了，而我只配讀英文。」而他的拉丁文重修一次才通過，因此同班有一位同學惋惜說道：「如果當年邱翁就如同我們現在一樣地修考古，我想他的拉丁文一定準過無疑的。」

在目前我們的考古學課程下，考期快到的前幾天，你只要早點到學校，留心教室內的動靜，你就不難看到幾乎所有班上的同學，都在忙着抄歷年來來路不明的考題，這個時候，只要你在不打擾別人工作的前題下，拿着一張紙和一隻筆靜靜地加入他們的行列，他抄你也抄，他畫葫蘆你也畫葫蘆，那麼你就是在這個時候修習考古學了。

這種場面往往是非常激烈壯觀的，所有在教室裏的同學都表現得非常賣力，而且有合作無間的感覺。

一傳二，二傳四……一直傳抄下去，不到細菌分裂一代的時間——約三十分，學生人人手上都已經有了一份了；有時候，心腸比較善良的同學，把它抄在黑板上，使人方便得多，真是功德無量。照我看來，這種場面是醫學院學生表現得最不自私的地方，這大概是面對著共同的敵人，大家同仇敵愾，格外顯得和諧團結，這在考古學史上是一幅令人可歌可泣的場面。

有時為了避免抄寫的麻煩，以及提高效率，早已有人利用印刷業來推動考古學的發展，這包括碳紙繕寫、臘紙繕寫、臘紙打字及鉛印等；有的是免費供給的，有的是酌收工本費的，在印刷的末尾，有時可見 Good luck 或 Happy holidays 的字行，令人感到親切而覺得錢花得並不冤枉；然而，有些是高價推銷的，同學也是無可奈何，只好存下幾文看病錢忍痛買下，有少數的同學就是這樣而發了一筆考試橫財，這種取人於危的行為真是可恥，這與考古原來的精神違背太多，是為人所不齒的。三年來，筆者已經花了一百二十四元頗為可觀的考古經費。

最為艱鉅的考古工作，該算是資料 (material) 的爭取，而資料要靠前人賜予，但是事隔一年，記憶往往有點模糊，就是所得到的資料有時連篇都是郭公夏五，語焉不詳，真是令人費解。科學無國籍，考古學當然也沒有校界之分，某教授第一天在甲地甲校主持考試，第二天乙地乙校同科的考試，在他還沒到乙地以前，乙校的同學早已獲得甲校當天的試題。有些同學在考試的前夕，深夜不眠為資料到處奔波，其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偉大精神，實在令人可敬可佩。資料也有祖傳的，有一次在班上看到，某某同學的父親在學生時代的解剖學考題。有些由於一次考試的試題太多，或是由於試題受到嚴重的控制（如病理學和藥理學等），資料的搜集工作常常遭受困難，往往必須動員五、六位先輩，聚集起來集體創作才能得到，這毫無版權毫無保留的「前人種樹」精神，也是值得後學者死當結草的地方。有時某科的資料特別豐富，教授從光復到現在，在不同學校的考題，都能盡收無遺，有時使人感到花在考古上的時間，反而比起單讀教科書而按步就班好好準備的，來得浪費。偶而，白天所考的資料會在當天夜間部的考卷中出現；或是夜間部的資料，可能一字不易地出現，在第二天早晨的試題上，這項趨勢發展，使考古者不得不更加警惕而密切注意。

所謂考古出現率 (archaeological recurrence rate)，是說手中所得的資料，出現於當次考試卷中的百分比，通常是資料所佔的分數，乘上 100% 而定，這出現率是不一定的，往往依照教授的脾氣而不同，有些教授每年都是那幾道題目，有些則千變萬化，每年均以新的姿態出現，使人感到丈二金剛摸不到頭腦。照高醫的校方文獻報告（南杏第十一期），該校的這項出現率為 20-70%，平均在 40%；同樣的統計報告在北醫還沒有人做過，不過據筆者所知，北醫的變化量 (variability) 可能較大——有一次解剖學老師剛開學的第一天，就在課堂如同法院宣告一個人的死刑那樣嚴肅鄭重地說：「一切考古無效」這句話當然是對考古者當頭一棒，使之百分率降到零；但是有一科的出現率高達百分百，因為那位教授每年只出那固定的四道題目，不多也不少，年年如此，這大概是他的「以不變應萬變」之道。另外，筆者得有一次心臟的雜音 (heart murmurs) 都還不懂，心電圖 (E.K.G.) 只通六竅，而只花三小時的考古工作，居然也在那科的考試中考了個八十分，現在想起來，覺得真是不好意思。

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尤其在資料獲取方面，更需要神通廣大的同學，聚集幾位同心協力集體行動才能勝任。有鑒於此，差不多每班都有請專人負責，而成立考古股，並設考古股股長一人，與班上學術股和康樂股長等都是重要自治幹部，而此股股長的人選較之更為慎重，其聲望除班長一人外，無出其右。以一個同學能夠被選上考古股股長，他的經歷他的來頭都算是不小的，而這項頭銜在同學的心目中，算是一項無上的光榮。

每年暑假全省醫學院高年級的學生，必須前往衛勤學校接受為期數星期的分科教育，因此有了好機會使台大、高醫、中醫、中山、國防醫學校及北醫的學生生活在一起，由於各校的考古水準都是相當高，文化背景各有不同，各有各的一套。因此考古人才聚集一堂，使帶來的文化互相接觸，互相融合，然後相消化，而滋長出較新的文化，利用這文化交流的機會，考古學每年不但能夠在各醫學院中，維持了相同的水準，而且能夠在技術上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。

今年大家在那裏合作得很好而成就輝煌，譬如其中一科考試，考古考得非常成功，考試前大家心中就知道是非題十題中，除了第二和第七兩題外，其餘的答案都是「是」，選擇題的答案是「3 3 2 1 1

2 3 2 1」，而這項記憶法又頗新穎，我們不是用阿拉伯數字一二三死背下來的，而是採用音樂符號「豆雷米」唱出來的，只要你照着唱，這不是很像世界名曲「划船歌」的開始幾句嗎？由於這次的大成功，使得全體同學都得滿分，教官高興，我們也笑臉逐開，恐怕上級說他「教導有方」，而說我們「好古敏學，孺子可教」！不過，我們也失事一次，原來另一科的考題甲卷換了乙卷，使不少的同學幾乎全軍覆沒，幸虧大多數的同學發現得早而及時應變，否則更是不堪設想，這是醫學考古學史上的一大事故（accident），在此事故中，不幸中的大幸，是只有六位同學成仁，必須留下來補考才可結業。

在其他的院系裏，不知有否像醫學考古學的類似學問？聽說也是有的，但是在制度上、技術上或是經驗上，都比不上醫學院裏這樣龐大、老練或豐富的，而且只限於少數幾個分數蟲，又聽說其中有一兩個，因為此技在身而榮獲國內外獎學金，因此傳為美談。筆者有一位朋友，他去年才剛從美國學成理工歸來，在一次聊天中，他非常感慨地向筆者表示說，他在數千里外的太平洋彼岸，才從來自不同母校的同校同學學到了考古，他不但覺得相見恨晚，而且感到十分慚愧。其慚愧而嘆不如的心情，比起曹孟德路過曹娥碑「乃覺三十里」，還要大一百倍，因為他最後向我大嘆一聲道：「乃覺三千里」。

在同樣一間學校裏，大體說來，儘管中國學生的分數比外國人高，成績比他們好；但是畢業以後，社會的適應力，以及所學專業的繼續上進，則我們不如他們棒。有人說這是由於外國學生一般來說，受宗教的影響比我們來得深，因此他們表現得比較老實；有人說由於他們比我們笨，考試一到他們只知道把書本逐頁大小字一直讀下去，不像我們這樣聰明——筆記好，重點捉得對，甚至考古全，當然他們考輸我們。這樣一來，中國學生只會「考古」而不「知新」，只懂得所謂重要的，而那些「不重要」而尚待研究的新問題——通常在教科書中是用不引人注意的小字體寫的，當然我們懂得比他們少，以致畢業以後離開了考試，就沒有什麼新東西可以研究。

我國諾貝爾獎金得獎人——李政道和楊振寧博士，筆者相信他們在西南聯大母校時，根本沒有我們現在這份福氣可以修到考古學，因為時值八年抗戰艱苦的時候，在「一切為前綫，一切為勝利」的口號下，一切從簡，可以省的就省了，當然學校裏考古學這門課程也免了。

醫學考古學成立之初，其主旨是崇高偉大的，是天真單純的，只是利用它來對付醫學院內的各項考試的，但是也被誤用在其他方面，最卓著的算是美國醫師檢定考試（E. C. F. M. G. ），檢定考古集，有台大版、高醫版及北醫版等，年年有新版，參加考試的人幾乎人手一冊，使我國在這項考試中的錄取率甲於天下，而使其他國家醫學院學生感到銳不可當，就是到目前還沒有附屬醫院設備的醫學院校的學生，也考得「令人滿意」而使美國人覺得「不可思議」。印度，你可知道，她比我們早就多好几座原子爐了，他們的醫學教育也不能算是太落後，可是他們的這項錄取率還不到百分之二十。

有一次，教育部歐洲語文中心舉行招生考試時，有一位醫學院低年級的考生，跑去求教一位高年級的學生，要向老先輩拿考古資料，可是由於他讀過三年多了，德文早就忘了，考古資料當然也無從想起，這位小弟失望地說到：「沒有考古資料怎麼考呢？」由此可知同學對考古的依賴性，好像沒有考古就不能參加任何考試似的。

學校裏有考古學好呢？沒有好呢？下一代的教育家自有定論，不用現在去回答這個問題。聽說學考古的先生，一旦培養了考古學的興趣，對任何舊老的東西都喜歡，這對家庭安定有很大的貢獻，因為太太愈老他愈欣賞；況且目前的考試風氣實在令人不敢恭維，不但霸王型有之，槍手型有之，而且課桌上盡是滿面瘡痍，真是人心不古，在此時提倡考古，使學生復古一下，似乎有此必要。



如果Freud還在的話，這兩位同學的行為是有意義的。（Negro）